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国际发展研究进展

CURRENT ISSU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2年7月 第3期(总第3期)



境外媒体眼中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会议”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on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唐丽霞 李小云

TANG Lixia LI Xiaoyun

走出去的中国资本：文化遭遇与融合

——针对一家中资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

Chinese FDI: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rossvergence

---A Case Study on a Chinese Enterprise in Tanzania

张莉 徐秀丽 李小云

ZHANG Li XU Xiuli LI Xiaoyun



编者按

自二战以来，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国际发展正日益成为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政治与安全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国际发展干预为载体，从概念、政策到手段，从制度、机构到人员，已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框架。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逐日扩增，及其在对外交流与合作理念、方式上的独特性，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将中国纳入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面对上述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更好地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建议，同时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对话能力和影响力，是当今中国国际发展研究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历经六十多年的摸索之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研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失败案例，并形成一系列制度化的框架，这些经验、教训及框架成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国际发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资源。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发展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发展咨询，90年代的发展研究与教育，一直到进入新世纪后设立的中国第一个国际发展教育项目，我们创立了国内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系统的从本科到博士，从针对国内学生到涵盖国际学生的国际发展研究的教育、研究、与咨询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尝试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探索具有中国视角的国际发展研究途径，另一方面，我们与国际发展研究学界保持密切的对话和沟通，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框架内前沿的相关讨论。

我们的国际发展研究从基本资料的收集开始，近期主要集中介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委员会在不同阶段所通过的三个宣言，作为国际发展规范、规则和共同目标的一部分，它们体现了发达国家在开展国际发展集体行动中的一种集体性程序。为进一步加深对这些基本概念、基本数据和基本观点的理解，我们也将附上国际著名专家在相关方面的前沿性论文。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与管理体的梳理开始，我们逐步呈现国际发展框架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并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介绍给大家，供决策者、学者和相关机构参考。

编者

2012年6月6日



境外媒体眼中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会议”¹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ports on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唐丽霞 李小云

Tang Lixia Li Xiaoyun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100193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摘要: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又一次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多家境外媒体都及时报道了有关论坛的相关情况, 对中国在论坛中提出了未来五点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毫无意外, 外媒关注最多的仍然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援助、中非贸易和投资关系, 对于论坛所提到其他关注非洲民生、非洲需求和非洲一体化发展的内容却报道甚少, 非洲国家的声音也鲜有提及。

关键词: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优惠贷款, 投资和贸易

Abstract: The Fi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International media reported intensively on the top five priority area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ount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 particularly concessional loa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ceived the most concern, while the livelihoods of African people, African need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were far less discussed. The voices of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neglected in the media coverage.

Key words: The Fi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concessional loan, investment and trade.

¹ 本报告撰写过程中, 人文与发展学院的陆继霞老师和研究生赵越提供了丰富的媒体资料, 在此表示感谢。



7月19日-2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一共有5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以及非盟作为区域组织代表参加，中国政府在此次论坛上提出了中非合作的五个重点领域，形成《2013-2015年北京行动计划》，明确了中非在政治、经济、发展、人文交流以及论坛机制等方面的合作方式和重点领域，成为今后三年中非合作的主要指导性战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初创于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标志着中非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间集体对话与合作的新平台，是促进南南合作的有效机制”。中非合作论坛在促进非洲发展和中非共同发展方面的作用，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CCS）在其系列的中非论坛合作研究报告中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构成了促进中非关系的主要支柱，也是建设性外交关系的平台，为促进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外交机制，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肯定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促进南南合作的独特机制（CCS，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非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非洲大陆总体经济的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在国际社会影响力不断上升，也逐渐成为国际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一、中非合作论坛吸引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

中非合作论坛开始于2000年，虽然第一次峰会对中非合作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太多西方媒体关注此次峰会，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还不是很突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合作论坛所形成的重要文件更多具有政治含义，在第一次峰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有关中非贸易方面的一些优惠待遇和政策以及延续传统的中非合作行动外，除了明确提出要免除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人民币债务外，并没有提出太多的实质性的明确承诺。不过，虽然媒体报道不是非常热烈，但是西方媒体仍然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减债承诺的敏感性，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还是围绕中国提出的减债承诺进行了一些讨论。2003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二次峰会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政府在此次峰会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带有数字化的减债或者是优惠贷款以及援助方面的承诺，在媒体上都很难找到关于此次峰会的报道。

2006年11月，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峰会被认为是中非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国内官方媒体，像人民网、新华网等都开辟了专栏，国际媒体也开始积极关注，如英国《卫报》评论“这次峰会是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表示“中国模式的魅力：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他们也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今日美国报》则认为“中非峰会将突出中国与非洲日益加强的联系：前者是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后者一直是被全球化遗忘的大陆”；日本的《产经新闻》称“中国宣布将减



免非洲有关国家的债务，这是对非洲的罕见优惠措施。比起强调人权来，更要确保资源——中国已经明确了重视实际利益的外交态度”（新华网，2006年²）。美国的《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了题为《为了战略性目标，中国向非洲示好》的长篇报道，不仅全面介绍了中非合作论坛，还回顾了中国和非洲的关系的变化，该报道还引用了一名南非政治经济评论家的观点：“中国不是第一个进入非洲的强大的外国力量，但他们可能是第一个集援助者、老师和征服者为一体的力量，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思想的盛会”。

此后，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正如今年7月19日论坛开幕以后，7月20日，国际主流媒体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了相关报道，如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英国广播电视公司、法国路透社和法新社、印度的《印度教徒报》以及南非的多家媒体的网站上都能够找到篇幅不短的报道和评论。一些媒体甚至在会议之前就开始重点关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如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在7月2日报道中国在安哥拉的基础设施建设，在5月份分别组稿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其他行动。

国际媒体对中非合作论坛态度的转变，原因之一是中国在论坛上的承诺不断增加，越来越数字化和具体化，并且中非合作论坛的后续行动证明这些承诺不再是口头的政治承诺，而是落到了实处。以《华盛顿邮报》为例，2006年报道中非合作论坛的题目是“中非峰会开出了19亿美元的大单”，2009年报道题为“中国向非洲提供10亿美元优惠贷款”，而今年，大部分境外媒体都用了“中国向非洲提高20亿美元优惠贷款”为题来进行报道，由于这些数字间的倍数关系，很多媒体也都使用了“加倍对非洲的优惠贷款”（double）这样的短语来吸引社会的关注。

原因之二是中国政府对在论坛上提出的各项承诺的积极兑现。中国在2006年的峰会上提出要建立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2009年提出要建立2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目前大部分示范中心已经建成并开始运作。中国承诺的减债和提供优惠贷款、基础设施建设、派出专家、开展培训等活动都在峰会后得到了很好的兑现。承诺在短时期内快速兑现，对传统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冲击：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表示要将国民经济的0.7%用来提供对外援助，但即便到现在，也只有一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承诺；世行主导的减贫战略行动和减债计划设置了多个标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至今还不能受益于已经提出近20年的行动计划。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所体现出来的“中国速度”让国际媒体吃惊。

原因之三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下，中国和非洲大陆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自2009年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

2 国际舆论称中国在非洲成功反映了欧美的失败，<http://news.sohu.com/20061106/n246220561.shtml>



地 (FOCAC, 2012 年³)。BBC 是最早报道中非合作论坛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 在 2000 年, 就以“中国减免非洲债务”和“中国将扩大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为题报道了中非合作论坛, 从报道内容中可以看出当时 BBC 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态度是相当保守的, 报道说: “虽然非洲大陆非常欢迎中国的减债计划, 但是这只是非洲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 影响甚微; ……虽然中国政府承诺对非投资, 但是这些承诺仅具有象征意义, 和西方相比, 中非贸易如九牛一毛,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 2012 年, BBC 则在报道中援引中国的官方数据, “2011 年中非贸易达到了 1660 亿美元, ……非洲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廉价商品的销售市场”, 在报道中还用图表的形式展示了从 1995 年到 2010 年中非及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

二、中国对非承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从 2006 年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对非合作八项举措”开始,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向全球, 尤其是非洲国家发布对非政策的重要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国和非洲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要行动指南。表 1 列出了近 3 次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承诺, 可以发现: 第一, 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优惠贷款数量成倍增加, 能力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第二, 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展, 从最初的关注与政治和商业经贸合作, 逐步发展到环境、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气候变化, 甚至国家和区域安全等多个领域; 第三, 合作的主体在不断增多, 不仅体现为更多的非洲国家加入了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和非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合作也逐渐走向了实质性阶段; 第四, 论坛依托的合作机制在不断完善, 中非合作论坛虽然是一种多边行动机制, 但后续行动却都建立在双边合作机制上, 但此次论坛提出要进行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机制将要发挥作用。

表 1 历年中非合作论坛中方的承诺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金融承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2009 年对非援助将增加一倍 - 3 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 3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 20 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 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于 2005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供 100 亿美元优惠贷款 - 设立 10 亿美元的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 - 免除 2009 年底到期未还贷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向非洲国家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

3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后续行动落实情况, <http://www.focac.org/chn/dwjbzzjh/hxxd/>, 2002 年 7 月 18 日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底到期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贸易和投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供 3 亿元帮助非洲防治疟疾 - 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为 50 亿美元 - 把 30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零关税商品由 190 个税目增加到 440 多个 - 3 年建立 3-5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取消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95% 的产品的关税和配额限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能力建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 年内非洲培训 1.5 万名各类人才 - 向非洲派遣 100 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 10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 建设 30 个预防疟疾中心 - 向非洲派遣 300 名青年志愿者 - 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由目前每年的 2000 人次增加到 4000 人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实施 100 个中非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目，接受 100 名非洲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工作 - 3 年为非洲培训 2 万名各领域的人才 - 为非洲国家援建的农业示范中心增加到 20 个，向非洲派遣 50 个农业技术组，为非洲国家培训 2000 名农业技术人员 - 启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 培训 1500 名校长和教师，每年向非洲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 5500 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增加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建设 - 为非洲培训 3 万名各类人才， - 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 1 8 0 0 0 个， - 为非洲国家援建文化和职业技术培训设施； - 继续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资助双方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展 1 0 0 个学术研究、交流合作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援建非盟会议中心 - 援建 100 多农村学校 - 援建 30 所医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援建 50 所中非友好学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方将派遣 1 5 0 0 名医疗队员 - 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 - 开展“中非民间友好行动 - 为非盟在非开展维和行动、常备军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增加为非盟培训和平安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数量

境外媒体非常关注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的承诺，大部分的新闻都是以中国的某一项承诺为标题，然后再进行阐述和评论。中国政府的各项承诺中，最吸引西方媒体关注的是向非洲提供的优惠贷款，大部分媒体都是以此为新闻标题来展开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报道，如表 2 所示。



表 2 部分境外媒体对中非合作论坛报道的题目

报道机构	国家	英文原题	中文译题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	美国	With \$20 Billion Loan Pledge, China Strengthens Its Ties to African Nations	20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中国加强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英国广播公 司 BBC	英国	China Pledges \$20Bn in Credit for Africa at Summit	在峰会上中国承诺向非洲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
商业报道 Business Live	南非	China Strengthens Africa Ties with \$20 Billion in Loans	中国用 200 亿美元贷款拉近和 非洲的关系
卫报 Guardian	英国	China Offers \$20Bn of Loans to African Nations	中国向非洲提供 200 亿美元贷 款
星期日时报 Sunday Times	南非	China Doubles Loans to Africa to \$20 Billion	中国承诺给予双倍贷款, 达到 200 亿美元
印度新教徒 报 The Hindu	印度	China Makes \$20 B Credit Pledge to Africa	中国承诺给非洲 200 亿美元贷 款
法新社 Agency France Press	法国	China Doubles Loans to Africa to \$20 Billion	中国承诺给予双倍贷款, 达到 200 亿美元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美国	China Pledges \$20Bn in Credit to Africa	中国承诺给非洲 200 亿美元贷 款
路透社 Reuters	法国	China Strengthens Africa Ties with \$20 Billion in Loans	中国用 200 亿美元贷款拉近和 非洲的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对于中国向非洲提供优惠贷款的承诺, 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从非洲政府和西方社会对这笔贷款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进行讨论。西方媒体报道中肯定了这笔优惠贷款在非洲大陆非常欢迎, 会增加中非之间的联系, 法国路透社认为“中国向非洲承诺提供 200 亿美元的贷款, 无疑会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 这是最新的一项对最贫国国家的发展贷款”。从上表中的新闻标题也会直接看出西方媒体对贷款的态度, “拉近中非关系”的作用十分明显。英国《卫报》表示“中国的无条件贷款吸引了非洲政府, 非洲国家宣称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虚伪的西方一味的演讲了”。

对于这笔贷款, 西方媒体更多持批评态度, 路透社表示“贷款会使得西方非常不舒服”, 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 中国提供贷款无附加条件, 这是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 也是全球南南合作区别于南北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方主导的南北合作是有条件的发展援助, 如结构调整计划、减贫战略文件制定和审查等。路透社批评“中国也将贷款提供给忽略人权的国家, 将贷款提供给人权纪录糟糕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资源”, 《泰晤士报》也指出“中国在提供援助



时不考虑人权纪录，也不考虑政府表现”。其次是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向非洲提供优惠贷款更多的是让中国经济增长受益，而非洲国家受益程度有限。路透社的报道就称“优惠贷款会拉进中国和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原材料，特别是石油主产国和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纽约时报》也宣称“随着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整个非洲大陆已经成为中国原材料的主要产地”，《泰晤士报》表示“中国在非洲大陆建设基础设施，如道路，是为了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英国广播公司称“中国已经从在非洲的巨额基础设施项目中获益”。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大量使用中国本国的劳动力和建筑原材料的方式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一致抨击，英国《卫报》就称“中国被指责从中国雇佣工人到非洲建设医院和道路，并且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从中国进口，没有给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这一点法国路透社也持同样观点，在报道中称“中国从国内引入劳动力去建设在非洲援建的道路、医院等基础设施项目，攫取当地资源，只留出很少的发展空间给当地人”。

这种批评已经由来已久，英国广播公司在2006年就以“人权问题”为小标题来对中国的优惠贷款提出批评，“中国的现金支持从来没有和民主和人权联系在一起”，2009年则提到“中国忽略了与之合作的非洲国家的人权纪录”；《纽约时报》在2006年第一次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长篇专题报道时批评到“中国没有遵循国际贷款的打击腐败的准则”，2009年也提到“中国贷款没有条件，西方贷款通常要附加改善治理的条件，而这成为非洲国家欢迎中国贷款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也在一直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驳斥了西方的批评，很多媒体也分别转述了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批评的态度。对于中国政府的回应，英国《卫报》在报道中援引了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论坛上的发言，“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媒体总是给中非关系贴上负面的标签，来阻碍中非合作，中国不干涉内政政策，是因为非洲人最清楚自己。”美联社称“中国正在尽力避免被贴上‘非洲新殖民者’的标签，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援引了胡锦涛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洲，推动和谐均衡的全球发展，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倚富压贫”。对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并没有促进非洲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英国《卫报》在报道中称“中国反驳到中非经济合作和贸易对非洲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分之一”，对于此，南非的《商业报道》报道称“正是中国坚持不懈的援助，非洲才变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大陆”，该报纸还援引了该国总统祖马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相信中国在非洲的意图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欧洲只关系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和中国是平等的，我们的关系是互惠的”来证明这一点。

此外，国际社会还非常关注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承诺，大部分报道中都引用了胡锦涛主席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将加大对非洲的援助”，但又都非常敏感地提出“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数字”（路透社），《纽约时报》也称“到底中国会兑现多少对非援助，援助将流向哪里，这些都不会很明晰的，因为中国对非援助项目从来就没有清楚的



公开过”，不过对于这一点《纽约时报》则援引华盛顿的一位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专家的观点对其进行了解释，“是非常难以判断中国要提供多少援助给非洲，因为西方国家和中国官方对援助的理解是不同的”。

此次论坛上，中方还提到了要将优惠贷款的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但西方媒体似乎更关注中国会投向到这些领域的优惠贷款更为具体的细节，如投入比例和提供时间、周期等，法新社在报道中提到了这些，但同时也提到“中方并没有明确这种投入结构持续到什么时间”，可以想见，在今后三年里，国际社会一定会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在这一点兑现的程度。

虽然，在论坛期间，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在农业、能力建设、区域组织发展、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具体承诺，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内，还承诺要增加农业示范中心建设以及继续派出农业工作组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对非援助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非支持的重点从商业转向了民生，从“以我为主”转向了满足非洲发展需求为优先，以双边兑现合作机制为主转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利用多边平台，以政府主导为主开始转向社会全方位参与等，但是这些并未引起西方媒体的重视，大部分媒体报道对此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加强对这些领域内承诺兑现以及对非洲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宣传是十分必要的，这些也才是揭去“非洲新殖民者”标签最好途径。

三、新措施中未直接提及的贸易和投资仍然是关注热点

正如前文提到的，2000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虽然中国就提出了“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的承诺，但是正是由于当时中非在经贸合作方面的表现和西方相比过于微小而没有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但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和投资开始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此次合作论坛中方提出的五大合作重点领域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在促进中非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措施，但是西方媒体仍然普遍在报道中关注了这个问题。

在报道中，大部分媒体都直接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了中非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最新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了“2011年中国向非洲出口增长了22%，达到了770亿美元，是肯尼亚或者埃塞俄比亚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英国广播公司提到了“中非贸易额达到了1660亿美元”；法国路透社则提到了“在过去十年里，非洲向中国的出口从56亿美元增长到932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向非洲大陆投资了近70亿美元”，印度《新教徒报》则报道了“2011年非洲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承包的第二大市场，海外承包上投资总额达到了360亿，比2009年增长了28%”；同时还提到



了“在星期四举行中非企业和企业家论坛上，有5亿美元的合同被签订”。

除了引用中国的官方数据以外，一些媒体还使用了一些非常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和非洲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法新社用“浪涌”来形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增长，并称“中国已经开始进军非洲的自然资源，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华盛顿邮报》还专门在尼日利亚采访刊发了题为《中国商品已经成为非洲制造商的负担》的报道，援引当地一名小商人的话来描绘中国和非洲的贸易：“所有的一切均来自中国，质量比以前好很多，价格也更加便宜，中国帮助我们能够买得起这些东西”，还转述了尼日尔总统在伦敦接受访问时的一段话：“他们的商业活动已经蔓延整个非洲，自然资源、铀和石油，我们是开放的国家，像所有的投资者开放，我们想要的是双赢的经贸关系，这就是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我们保护我们的利益，他们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但是批判中国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媒体看待中非合作关系的一种惯性，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中非贸易和投资，批评之声也日益增多。围绕此次中非合作论坛所进行的报道中，很多西方媒体都直接援引了南非总统祖马的发言：“中非贸易的结构---非洲向中国提供原材料，并从中国进口制成品---这种贸易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非洲国家和欧洲之间经济交往的教训应该成为非洲和其他任何经济体开展合作时必须考虑的”，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的批评，而忽视了祖马随后的发言中提到的“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从主要媒体的报道中可以总结出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批评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中国和非洲的贸易结构，认为虽然中国在和非洲的贸易中处于逆差，但是从非洲进口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材料，向非洲出口的是拉动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也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体现，美联社就非常直接的在报道中说“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其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中国从非洲进口自然资源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非洲大陆又是中国出口机械制造和电子产品的重要市场”。第二，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企业的不良投资行为，如中国企业在非洲虐待非洲劳工、腐败、违反劳工法，更多雇佣中国的工人以及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美联社这样评价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带来了虐待劳工和腐败的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巨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贫困大陆之间不平等的伙伴关系”。第三，批评中国和非洲之间进行的非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

不过，媒体也注意到中国政府要调整中非投资贸易现状的努力和决心，《纽约时报》就报道称“中国企业雇佣中国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将会致力于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和非洲人一起努力来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印度新教徒报》则报道了中国政府官员的一些表态，“中国政府已经告诫中国公司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要履行社会责任，要造福当地人民。中国公司已经在非洲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这远远要多于虐待劳工，只是媒体并没有报道”，“中国企业已



经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内容和范围，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宣传和报道自己做的有意义的事情，从而应对西方媒体的负面和不实报道”。英国《卫报》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位中国官员的话“即便是中国投资额正在增加，中国投资额也十分有限，西方投资占了90%以上，尤其是在自然资源和矿产领域，我们不是来竞争的，我们是来合作的”。

四、中非合作：非洲的声音被淹没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大陆的一个多边合作机制，是中国和非洲大陆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对话和合作，但是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讨论的是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承诺，讨论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中非合作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即便是批评，也批评的都是中国这一边，而非洲大陆的声音却被媒体集体“忽视”了。在对此次中非论坛的各种媒体报道中，除了引述了南非总统祖马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外，几乎难以见到任何有关非洲各国对中非论坛的评价和态度。从有限的网络搜索中，只看到前面已经提及的《华盛顿邮报》在非洲做的一次专题，来讨论非洲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和贸易的，报道表示“非洲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在一些国家，如南非和肯尼亚，便宜的中国商品已经导致了当地工厂关门”。报道还采访了一些非洲人，这些人对中国的投资有着不同的看法，如南非一家玻璃制品公司经理认为“我们无法和中国竞争，这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和中国企业竞争，我们必须降低50%-80%的工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企业的进入已经严重影响了南非的就业，对我而言，中国正在出口失业。”在尼日利亚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进口虽然已经影响到当地纺织业的发展，但当地人表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管理是造成尼日利亚企业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肯尼亚一家企业主表示中国的投资修建的道路已经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但是电力成本仍然很高，“如果这些没有发展，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竞争力”。据此，《华盛顿邮报》指出“非洲人将更多未发展的原因归结于本国政府，而非中国的投资”。这样看来，非洲的声音被淹没也就情有可原了。

虽然西方社会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给中非合作论坛贴上了“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但是非洲大陆对中非合作论坛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参与积极性日益高涨。南非的CCS2010年的一项覆盖非洲7个国家和2个区域组织的研究表明中非合作论坛在整个非洲都受到欢迎；中国中非合作论坛的援助一揽子服务相对比较容易磋商并为非洲国家的项目发展提供很多新机会，此外，非洲领导人对中国的热忱和完成项目的实力充满赞赏。报告总结了非洲大陆七种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态度：1) 对中非合作论坛“完全满意”。2) 扩大非洲人对中非合作论坛进程的参与度；3) 非洲国家应该限制与中国以及所有外来力量的交往，避免陷入新殖民主义 4) 借助中国的资源和合作促进非洲发展。5) 非洲国家应该非盟的领导下



参加非洲合作论坛。6) 中非合作论坛应该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合并。7) 非洲应该和各方力量进行对话，形成竞争之势。

五、结论

中非合作论坛结束，形成了《北京行动计划 2013-2015 年》，成为今后三年中非合作的重要战略性指导文件，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论坛高度关注，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非洲的支持承诺，尤其是和传统的西方主导的规则和要求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援助，对于中国政府在历次峰会上逐次加大贷款规模，西方媒体格外重视，并且也批评甚多，甚至将其称为“支票簿”政策。中非合作论坛的直接成果是中非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投资遍布于非洲大陆，西方媒体对此也格外关注，也同样持批判态度，给中国政府贴上了“新殖民主义”的标签。虽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回应和驳斥西方社会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媒体也开始转述，但声音的力量仍然十分不足。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府对论坛后续行动的实质性兑现逐渐提升了中非合作论坛的国际影响力，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

参考文献

- [1] BBC News. Africans eye Chinese enterprise. 29 May 2012
- [2] BBC News. Angola's Chinese-built ghost town. 2 July 2012
- [3] BBC News. China pledges \$20bn in credit for Africa at summit. 19 July 2012
- [4] BBC News. Chinese colonialism? 19 July 2012
- [5] BBC News. Viewpoint: Africa must do more to profit from China. 22 May 2012
- [6] BBC News. China morning round-up: Property prices. 19 July 2012
- [7] BBC News. China gives Africa debt relief. 11 October. 2000
- [8] BBC. News. China expanding African education programmes. 12 October. 2000
- [9] BBC. News. China defends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ole. 23 December. 2010
- [10] BBC. News. China woos Africa. 10 October. 2000
- [11] The Times. Beijing doubles its loan commitments to Africa. 20 July 2012
- [12] The Washington Post. China's goods burden Africa's producers. 19 July 2012
- [13] The Washington Post. Zuma warns on Africa's trade ties to China. 19 July 2012
- [14]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the Prospects for "Trilateral" Development. 17 July 2012



- [15]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20 Billion Loan Pledge, China Strengthens Its Ties to African Nations. 19 July 2012
- [16] Guardian News. What is China doing in Guinea? 19 October 2009
- [17] Guardian News. The savannah comes to Beijing as China hosts its new empire. 3 November 2006
- [18] Guardian News. China can play key role in promoting peace and ending crises in Africa. 13 July 2012
- [19] Guardian News. Beijing's race for Africa. 1 November 2006
- [20] Guardian News. China where? 18 August 2005
- [21] Guardian News. The dragon and Darfur. 7 October 2006
- [22] Guardian News. US embassy cables: African countries prefer Chinese aid to US-China cooperation. 11 February 2010
- [23] CCS. 中非合作论坛（FOCAC）——政治缘由与政治功能. May 2012
- [24] CCS. 中非合作论坛：中非之间的贸易、投资与援助. May 2012
- [25] CCS. Summer in Beijing: FOCAC V is coming to town, but why this early- and how prepared in Africa? 9 July 2012
- [26] CCS. 评估中国中非合作论坛承诺在非洲的实施并规划未来. 2010
- [27] CCS. FOCAC: Addressing joint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May 2012
- [28]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China to double Africa loans to \$20B. 19 July 2012
- [29] 人民网. 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讲话【全文】. 2006年11月04日
- [30] 人民网. 非洲国家赞誉中非合作新举措. 2012年7月19日
- [31]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 中国龙准备在非洲再次腾飞. 2012年7月19日
- [32] 香港《南华早报》. 中国要做非洲真正伙伴. 2012年7月22日
- [33] <http://www.focac.org>.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后续行动落实情况. 2012年7月18日
- [34] 搜狐新闻. 外媒：中国多管齐下推进中非伙伴关系. 2012年7月20日
- [35] 山西新闻网. 中非 50 国高官宣布合作计划，外媒称中国“摆阔”. 2012年7月20日



走出去的中国资本：文化遭遇与融合

——针对一家中资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

Chinese FDI: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rossvergence --A Case Study on a Chinese Enterprise in Tanzania

张莉 徐秀丽 李小云⁴
Zhang Li, Xu Xiuli, Li Xiaoyun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5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摘要：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的资本走出去，世界开始转入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走出去的中国资本与东道主的“外围国家”产生文化遭遇与互动，进而凸显出新型的海外资本扩张模式，并重塑着全球商业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本文基于一家中资农业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之上，从中方人员与当地管理层的互动、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与应对、以及农业企业价值背后的国家因素等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作为混合文化载体的中资企业与作为另一种混合文化载体的当地管理层与工作人员产生文化会通融合的机制。本文的最后还联系国际学术文献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海外扩张中的文化研究视角、超越“本土”与“西方”二元视野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中的文化会通融合、及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中的文化自觉等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全球资本主义 文化遭遇 非洲 跨国企业 民族志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low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rom the emerging economies, including China, the polycentric world system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ism starts to take shape. The study on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rossver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is one of the key focuse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natur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capitalism particularly originating

4 通讯作者：李小云，博士，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减贫理论与实践。Email: xiaoyun@cau.edu.cn.



from the emerging economies, which reshapes the global business regime and capitalism system. The paper sheds light on three aspects based on a field study on one of Chinese agribusinesses in Tanzania, tha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managers and the local management team, local workers' resistance and responses of Chinese managers, and state value behind the operation of the agribusiness in local context. The paper makes three reflections in the end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respectively,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the capitalism development studies, the crossvergence study beyond local and western du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apital.

Key Words: global capitalism, cultural encounter, Afric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thnography

自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生产要素和世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从而产生一系列与经济活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现象,“图像(images)、人(people)、货币(money)、技术(technologies)”(Appadurai,1990)等要素跨越种种空间障碍,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加速流动,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市场上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即“国际惯例”(费孝通,2001)。这些“国际惯例”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惯例(Crawford,2000),其中尤以美国为主导,它直接导致美国模式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为许多后起国家在发展中模仿追随的对象。

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发展成一种全球制度并进而推动文化趋同的同时,差异性和地区性作为反抗霸权的力量和实践也一直存在。近年来,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全球资本扩张的重要力量,西方不再是第三世界边缘内中唯一的支配中心,世界开始转入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其对外资本输出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12年7月,中国已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4.2亿美元⁵;单看其对非洲国家的一些投资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每年对非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多,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共2000余家,涉及农业、电信、能源、矿业、加工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投资覆盖率达85%,遍布非洲各个角落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海外资本扩张的过程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合作司:2012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12-07-18 10:41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dgz/201207/20120708237916.html>
6“2000余家中国企业投资非洲”,2010年10月05日,网址:
<http://www.cb-h.com/news/shw/2010/1015/10101557GJGBHBH00332818.html>



在引进源自西方的现代商业模式以满足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同时，仍保留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并日渐重塑着现行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商业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目前学术界虽逐渐开始关注这一新的变化，但仍处于起步阶段（Yeung, 1999, 2000; Sum and Ngai, 2005; Lee, 2009; Gupta and Wang, 2003; Yeung, 2005）。

本文将以坦桑尼亚某中资农场为个案，从发展的人类学视角出发，从文化方面探究中方企业与当地人之间的遭遇过程。本文旨在分析农场中方人员在惯习的影响下，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当地环境，以及当地行动者如何回应，并比较中国管理者、非洲当地员工及原欧洲雇主在实践中不同的文化表达，及其在实践中意义构建方面的差异，进而探究中国文化对于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深层意义及影响。本文的最后还将基于此案例之上联系国际相关文献展开对话与讨论。

案例农场位于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基洛萨县的一个小镇，农场在当地被称作 China State Farm，主要从事剑麻种植和剑麻纤维的初加工，占地 6900 公顷，1999 年在坦桑尼亚注册成立，已经营了 12 年，是中国某中央农业企业属下的独资子公司。自 1986 年农场实现私有化以后至中方资本接手前，农场主先是英国人，再是荷兰人，而后是当地人，每任雇主的经营不超过 5 年。农场的中方管理者共有 5 人⁷，包括中方总经理，党支部书记（负责大田管理和后勤），总工程师，会计师、贸易负责人等。五人中只有一人能够用斯瓦西里语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但不能用斯语读写。其他四人都能够使用英语。在接手这个农场时，中方人员沿用了农场原有的部门设置并留用了当地主要管理者。当地管理层是一个包含总经理、总会计师、人事官员、机务官员、农田经理、保安队长等人的团队。他们大都在农场工作了多年，经历农场几易其主。除当地管理层外，农场的固定工人还包括技术骨干以及关键岗位的熟练工人。固定工人总数约 50 多人。由于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国际市场剑麻纤维价格持续上涨⁸，产品供不应求。因而农场中方人员将注意力主要放在生产而非销售方面，特别注意对整个生产链的控制和对员工的组织管理。

一、中方人员与当地管理层：制度化的薪酬契约与适应性的人情关系

农场建立之时正处于中国国内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组时期，改组目标是通过采用现代管理方法和西方公司体制的元素，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制企业改革

7 坦桑尼亚相关法律规定，在坦桑尼亚投资中心已申请投资优惠证书的投资者，根据工作需要允许雇佣 5 名外籍专家，参见

<http://tz.mofcom.gov.cn/aarticle/ddfg/laogong/200803/20080305445908.html>。截止至 2012 年 8 月，中方人员已上升至 7 人。

8 剑麻纤维价格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短期下降趋势，自 2010 年起又明显回升。



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司制企业，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为全球市场做准备（Hassard, 2010）。因而农场自成立之初起，在治理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西方现代公司制特征，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主要体现在：首先，农场完全按市场化运作，设立了董事会，中方经理形式上向董事会负责，董事会成员被委任确保经理最大化股东（国家）利益的任务，国有资产的回报率成为农场首要关心的内容，农场不承担诸如经济援助等政策性任务。其次，传统的集权化管理模式被摒弃，国内总公司不直接干预农场的日常经营活动，将权力下放给农场中方经理层，鼓励个人责任，大多数日常决策权都掌握在农场中方人员手中，中方人员的聘用以与绩效挂钩的三年期合同为基础，不同于传统国企的终身雇佣；而农场中方人员同样将权力下放给当地管理层，具体的经营和管理事务交由当地管理者负责，并与当地管理者签订规范化的薪酬契约来激励其为农场利益最大化。从西方经理人的视角看，这样的治理框架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可能是相当基本的，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们已经是激进的了。

在西式的治理框架下，中方人员与当地管理层在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关系实践模式，这种关系模式体现了几种传统和文化的交织和混合，又在实践中因为双方策略性和变通性的运作而建构出新的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提出，在中国，作为特殊主义信任基础的家族（准家族）的关系成为“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韦伯，1999）。而海外华人企业在组织层面，也呈现出“弱组织，强关系”的特征，它们以建立个人的、特殊的可倚赖关系为目标，并借此控制和管理企业（Redding, 1996）。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经营者同样需要依赖这种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来经营企业并控制风险。这不仅源于中国人“以情境为中心相互依赖”（许烺光，1960）的文化模式，也与非洲当地社会对人际关系的重视（Richmond and Gestrin, 1998）密切相关。但农场中方人员初到坦桑时，面对完全陌生的社会经济环境，他们自身极为缺乏可利用的特殊关系网络。为了迅速适应周边环境，他们只有突破种族与民族界限，在当地人中寻找适宜的对象，积极建构相互依赖的特殊信任关系。

中方人员首选的对象是农场的当地管理层。一方面，这些当地人在农场工作多年，对农场有较深的感情，“农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他们也以自己工作的农场兴旺为荣”⁹，因而他们与中方人员有共同的期望和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当地人有从事农场管理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经验，深谙坦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在农场工人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在当地有较广的私人关系网络，并且他们能够用英语与中方人员交流。对于不懂当地语言，又对当地制度规范与风俗习惯缺乏了解的中方人员而言，他们不得不在生产经营、对外沟通等各个方面依赖这些当地管理者。因

9 农场前任中方总经理的自述



而，中方人员迫切希望能够与当地管理者建立并保持特殊信任关系，以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但要让当地管理者接纳并信任之前从未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并非易事。中方人员采取了恩威并济的策略。一方面，在工作中，对当地管理者严格要求，使其感到压力，并树立中方人员的权威。中方人员经常带当地管理者到大田或车间去查看生产情况，即使酷暑或大雨这样的天气也不例外，一旦发现有徇私舞弊或工作疏忽，便要求相关负责人提交书面检查，或做调岗或停职处理。这让以往习惯于呆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听工头汇报生产情况的当地管理者叫苦不迭。农场的各种票据、清单无论金额大小，最终都要经中方人员仔细审核，发现错误便会不留情面地向相关负责人指出并令其重做。中方人员这样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地管理者徇私舞弊的行为，但却时常引起当地管理者的抱怨。人事经理曾对笔者说，“中国老板实在太严格了，每次去办公室找他，都要鼓足勇气”。

在当地管理者看来，工作中的中方人员是冷酷严苛的；但工作之外，中方人员却是“讲感情”的：每逢元旦，中方人员便邀请当地管理者到自己的驻地聚餐，共同庆祝新年；一些管理者家中农田多，每逢农田收获时，中方人员便派农场拖拉机帮忙运送收获的粮食。在当地管理者遇到生活难题时，中方人员更是主动伸出援手。一次，农田经理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他的母亲得了急病，需要马上住院。当地农田经理立刻向中方人员请假。中方人员得知事情原委后，马上让农场的出纳支出了一笔钱，交给农田经理，让他立刻送孩子去较好的医院医治，解了农田经理的燃眉之急。总会计师的一个儿子刚刚进入大学读计算机系，被告知每个学生都要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总会计师的家庭负担较重，一下子拿不出买电脑的钱。他和中方人员提到此事，没想到中方人员当即提出可以资助他一台二手的笔记本电脑。当总会计师之子即将大学毕业时，中方人员又设法帮助他联系到中国高校读研究生的机会。

中方人员在处理与当地管理者关系时，看似将农场工作和社会生活两个领域截然分开：在工作中强调严格要求、不徇私情；而在工作以外，强调情感联系和道德义务。但这两个领域实际上却是统一在一起的。他们将中国人最为熟识的“人情伦理”（阎云翔，2000）应用于与当地管理人员的社会交往中，帮助当地管理者分担家庭和部族的责任，以建立并维系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终究是为了确保当地管理者对农场的忠诚，寻求农场长期的稳定与发展。因而中方人员对人情伦理的尊崇不仅仅是个人层次上互动与交流的行为模式，而是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集体主义的倾向，它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是农场制度性文化的一个非正式方面，是农场能够正常运作的重要机制之一。它近似于沃尔德在分析中国城市单位时提到的庇护主义关系（Walder, 1986），可以说是中方人员对本国国有企业中传统关系模式的一种借用，是在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的一种合理选择，以减此来减少外部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使国有资本获取更多收益。



这与农场以往的西方雇主存在明显差异。一位当地管理者曾说过，中方人员为他们做的这些，“在前任雇主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欧美企业以“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为结构之基础（陈其南，邱淑如，1984）。农场以前的欧洲雇主对当地管理层在态度上虽然也不失亲切随和，但二者的交往主要发生在工作领域，双方的职责、权利与义务都遵照劳动合同上的约定来执行，而在工作之外，雇主并不认为自身有义务为员工私事提供帮助，分担其对家庭的责任。换言之，欧洲雇主与当地管理人员的关系仅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非个人化的关系，而双方之间的信任是一种基于正式制度规则约束的“普遍性信任”（福山，2001）。

当地管理者十分看重中方老板对自身的这种特殊“情谊”。虽然农场为当地管理者提供的薪酬水平，与坦桑其他同行企业相比，相对较低，但因为受到中方人员一些特殊的“礼遇”而得到平衡。当地管理者愿意在农场长期工作下去，并为农场的发展不断努力。他们认为中方人员与自身的这种庇护关系，是具有社会必要性并且是值得荣耀的。庇护关系很早就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非洲社会，并成为其社会结构的基础（维恩，2009）。当地管理者其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源大部分是由农场提供的，并且这些资源在农场外部是较为稀缺的，因而与中方人员建立和保持这种庇护关系，有利于当地管理者获得本来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当然，对于当地管理者而言，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基于理性计算，还包含着情感依赖和道德义务的成分。中方人员的“情谊”增强了他们对农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认为接受了中方人员的恩惠，就应该以满腔热情忠诚于农场。一天清早，一位农田经理浑身湿透、满身泥点走进办公室，向中方人员汇报大田情况。他对笔者说，“在我以前呆过的农场，我不会一大早就冒着大雨去大田查看，打电话给工头询问一下情况，能向老板交差就行了。但在这里，我愿意这样做，因为这里的老板是我的恩人，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这样做”。

总之，在西方企业治理框架下，用来规范中方人员与当地管理者之间关系、维护农场长期秩序的社会规范，表面上是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机制，而实际上传统的、非正式的人情伦理或庇护主义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后者虽然是非正式规范体系，却比前者更为人性化和高效率。对人情关系的依赖与传统庇护主义源自中方人员与当地管理者各自的文化传统，并且具有某些相似性，双方的实践与相互磨合创造性地将二者融为一体，并应用于跨国企业的雇佣关系中，成为企业的一种重要秩序模式，以规避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维护农场的长期秩序。在合作演进的过程中，中方人员与当地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感不断增强，两个在种族和经济社会地位上均不相同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整合到了一起。

二、劳资纠纷的发生与应对：和谐秩序观化解基层抗争文化

除固定员工之外，农场根据不同工期需要，临时雇佣的工人达 500 多人，主要



负责割麻、搬运、刮麻、晒麻、抛光、制绳等工作，这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较差，收入不稳定。工人们绝大多数都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他们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层工人大多只会讲斯瓦西里语，不会英语，难以与中方人员直接沟通。

在如何对待基层工人的问题上，中方人员最初沿用本国企业的习惯做法。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工人的“铁饭碗”，取消了终身制工作，去除了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住房、保健、娱乐等服务的功能，劳动力成为企业经济成本中更为灵活的因素（Andreas, 2008）。为了与外资和私营企业竞争，“甩包袱”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策略，他们习惯于压低工资、裁减冗员，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替代原来的国企工人。中国底层数目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务工比农业生产有更多收入的激励下，愿意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雅克，2010）。劳资纠纷问题较少出现，即便出现，也有当地政府出面协调平息。其实，灵活用工制度不只是中国，也是坦桑尼亚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坦桑尼亚也取消了其社会主义用工体系。对于中方人员，采取灵活用工制度是应对中非双方政治经济环境的自然反应。吸引农场所属总公司在坦桑尼亚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国内更加低廉。

但中国企业的这种习惯做法遭到了当地工人的频繁抗争，令农场中方人员始料未及。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被农场解雇的基层工人往往会通过法律途径，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申诉。解雇临时工人对中国企业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事，但在当地却受到严格限制。从原殖民宗主国套用而来的劳动法规，更倾向于雇员的权益，使得解雇雇员十分困难（许焯光，1960）。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当地人有着较强的法律意识。农场工人大多不识字，但却了解相关劳动法案，知道如何用法律途径向雇主争取权利。而农场的工会组织也会在工人的法律维权过程中提供支持。而基层工人更为“日常”的抗争形式（斯科特，2007）是不引人注目的“冷罢工”或怠工。这类抗争活动通常没有正式组织和正式的领导者，“不是由工会发起的，没有以工会的名义、用文字方式提出罢工的目的”；并且他们的规模较小，通常只限于某个部门的一部分工人；抗争的目标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劳工权益，如增加工资、提供长久的工作、改善农场卫生环境、修缮宿舍等。参与抗争的工人甚至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他们通过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连续几天共同消失在他们应该出现的工作岗位，避免与中方人员发生面对面的公开的交涉或冲突。

当地人有着历史悠久的草根抗争传统，翻开坦桑尼亚的历史，奴隶贸易、殖民统治、强制劳动、税收劳动体制等，在这种反复的压迫与反抗过程中，当地人积累了丰富的抗争经验。以往被剥削、被压迫的伤痛记忆，也使他们对外国投资者存在着固有的抗争情绪。在 1986 年坦桑尼亚推行经济自由化进程之后，当地村民作为农



业工人，针对来自欧洲的农场主，曾开展过周期性的罢工运动及破坏农场的活动。在当地人看来，中方人员与之前的欧洲雇主一样，都是冷酷的剥削者。但当地工人采取的反抗策略与以往不同，是一种非公开的、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这主要是因为工人并不愿意彻底激怒中方雇主。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人消费需求的提高，持续的工资性收入对当地工人而言越来越为重要。但是，由于种植业自然风险大、市场竞争激烈，近些年很多企业纷纷停产或倒闭，就连农场前身也在十数年间也经历了几兴几废，一些外国资本转而投资其他产业或其他国家。因而农业工人的就业并不稳定，就业机会较少。中资农场相比周边其他农业企业的一个优势在于，能及时按照剑麻农场主协会与种植业工会协商的工资水准发放工资，从不拖欠。对于工人而言，薪水虽然微薄，但能保证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他们不愿失去在中资农场的工作机会。可以说，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以及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形成加剧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余晓敏，2006）。他们只想向雇主表达自己的政治参与感，避免资方对其剩余价值的过度索取，因而他们并没有采取公开的集体反抗的形式，而是采用悄无声息的、低姿态的抗争手段，以争取更为人道、更有尊严的劳动权利。

工人抗争活动的频繁发生，使农场的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有效劳动力不足，劳动成本增加，生产效率下降，产量不稳定，中方人员深受其扰。在当地，工人抗争活动频发并不是只有中国企业才会遇到的问题，但中方人员对此却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焦虑与不安。因为在国内的农场管理中，他们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劳资纠纷频发，不仅会扰乱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影响产量和企业绩效；更有损于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企业当地的声誉，如果劳资双方的对立情绪得不到缓解，甚至会威胁到中方人员自身的安全。这种观念不仅出于对经济成本的理性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秩序观。中国人头等考虑的是建立与其社会环境相和谐的关系，强调通过道德的自律性和内在的约束功能来取得社会和谐（索罗门等，2003）。

为了缓和与基层工人的阶级对立，避免劳资纠纷的发生，中方人员不仅主动学习相关法律规则，逐步规范用工程序，更注意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更加柔性、更为人道的适合当地社会文化的管理模式，以改善与工人的关系，稳定农场秩序。

首先，充分发挥工会和当地管理层的中间人作用，加强与工人的沟通，通过共识建立信任与和谐的气氛。每个月，当地管理层都会代表中方人员与农场工会成员召开例会。工会成员事先广泛收集来自各部门基层工人的意见和想法，在例会中提出。当地管理层代表中方人员对基层工人的问题做出回应。对于工人反复强调、亟需切实解决的问题，当地管理层会提醒中方人员注意并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对工人做出承诺。这种常规机制使农场的经营管理更加透明，加深了中方人员与工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工人获得了向中方人员表达权益诉求的常规渠道，用一位工人的话说：“中国老板更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因而缓解了工人与中方人员的阶级对



立情绪。这正是中方人员希望达到的目的。

其次，关心基层工人的生活需求，改进向工人提供的基础服务。在例会中，工会代表反映较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活需求方面，如职工宿舍区饮用水的供应、农场诊所的服务等。工人的这些需求，不仅关系到自身，更包含了其家庭成员的利益。在当地，大家庭承担着社会安全和福利系统的重要功能，大家庭的需要依赖于他们有工作的亲属。因而可以说，当地人的职业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在了解了这些以后，中方人员更为关注向工人提供基础服务，为工人修缮宿舍、新修水井、为农场诊所增加医生和药品、修建职工俱乐部等，以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这些在中国国内企业中已被去除的、带有社会主义单位制特征的某些服务功能，在农场被重新建构起来。在当地，水、医疗等基础服务极为匮乏，农场宿舍区的生活条件明显好于附近村社住户以及周边农场。农场对员工提供的这些服务作为一种激励手段，不仅使大多数员工满意于现状，保持着生产积极性，更吸引了很多当地人来农场求职，为农场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

中方人员开始时的用工方式与当地工人的维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西方制度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但两者存在着较为激烈的冲突。而后中方人员在本国传统文化——强调通过自律促进和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汲取力量，转变了对待工人的方式，将社会主义单位制和非洲传统公社的某些特征融入现代企业中，以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这体现了某些中国文化特质在新环境下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包容性。从中也可以看出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运作过程，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彼此间存在着矛盾与不合，他们在不断的妥协中实现着发展的继续（Li，1999）。在相互妥协的过程中，源自不同传统的各类文化要素被有意或无意的重组起来，人们活动预料到的结果与意料不到的结果混杂在一起（Long，2008）。

中方人员在农场之外，与当地社区加强社会融合的努力，对于缓解农场内部的劳资纠纷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农场周边临近6个村社，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都会对农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一位中方人员这样说：“我们开始时，很少与周边村庄来往，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生产，以往这样就能相安无事，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村社紧挨大田，村民焚烧垃圾、折取剑麻苗制做凉棚等行为都会影响剑麻的生长。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强与当地社区的沟通和往来。”中方人员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在当地，社会交往是农业管理的核心（Buckley，2011）。为了能够融入当地社会，使农场在当地建立社会影响和威望，中方人员采取了很多措施：农场诊所以较低的价格向当地村民开放，以方便当地村民的就医；为周边村社联系中国官方援助者，建立村公所和试验田；为当地的小学提供建筑材料，修缮校舍等等。他们在与当地社区的交往中，有意淡化其投资者的身分，转而强调“中坦两国的深厚友谊”，强调中国是当地人的朋友。这种对“关系”道德的锻造可以抵抗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分裂（杨美惠，2009）。“将社交作为一大美德”的当地人，在很多程度上转



变了对中方人员的看法。农场在当地的社会合法性得以巩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工人对农场的归属感，缩短了劳资双方的心理距离，使相互之间的关系趋于融洽。以前年轻工人习惯称中方人员为 Boss，而现在他们更喜欢称其为“Baba”，愿意将其纳入非洲特有的社会性亲属关系中，将其视为“大家长”。农场中的劳资纠纷明显减少，工人的工作效率也随之提高。

三、农场的价值取向：企业背后的国家因素

农场中方人员不仅在与当地员工的关系实践方面，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经营者的文化特质；而且在自身角色定位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这既是中国特定的传统价值观的表现，也反映了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特有的价值取向。

农场的一位看门人曾好奇地问笔者：“中国人周末都不休息吗？”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几乎没有看到中方人员在周末休息过。这一习惯始于农场成立之初。每天一大早，中方人员就会出现在剑麻田间或纤维加工车间，监督工人定植、查看剑麻长势，或组织工人维护机器、改进配件，风雨无阻。他们背着水壶、带着草帽、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脚上的雨鞋满是泥点，看不出一点老板的样子。即使是在节假日工人休息、工厂停工的时候，他们也会到工厂各处看一看，检查库房、机械设备、水电安全等，如发现问题，就会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负责人，让他们来处理解决。这一形象与员工们之前所常见的欧洲经营者的形象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欧洲经营者喜欢衣着笔挺地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出现在大田或车间。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欧洲老板都会和当地员工一起放假。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休闲权利。

更令当地员工感到不解的是，中方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简朴，甚至有些寒酸。直到最近，他们刚刚改建了驻地的餐厅，不用在露天做饭吃饭；他们出行用的汽车也是刚刚添置的，在此之前，他们常常与当地工人一起挤在一辆跃进车里上下班。五个中方人员只有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把破旧的老板椅和一张条凳是办公室里的全部家当。据当地管理者称，之前的欧洲经营者其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与中方人员相比要优越得多。“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汽车，他们的驻地陈设远比方中方人员更加现代、舒适。”

当地人对中方人员将节假日加班当作家常便饭，勤勉节俭的工作方式感到十分惊奇。但在中方人员看来，他们只是在尽守本分。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勤俭、持久的传统，“努力工作，不花没有必要的钱，耐心，锲而不舍”是儒家核心价值观之一。这种价值观源自历史悠久的中华农耕文明，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多一份劳动就多一份收获是



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其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为学者们所认同（Hofstede, 1988）。而在非洲经营农业产业更需要如此。由于农业本身弱质性的特点——前期投资大、利润率较低、风险高，加之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主要是电力供应紧张，环境不确定性较高，因而农业企业要在非洲生存下去并非易事，对农场经营者的持久性和耐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方人员的勤俭和持久性也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及其管理者独特的价值取向。农场中方人员在来坦桑前，他们都在国内的国有企业工作多年。虽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实践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及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原有的制度烙印仍然存在。这些中方经理人员不仅有着职业身份，而且具有行政身份和行政级别，他们是国家官员。对于他们而言，经营好农场，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仅是对企业股东负责的商业行为，而且也是关乎国家形象和发展大计的政治使命。他们深受计划经济时代所推崇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影响，对组织有一种心理上的承诺与忠诚，希望通过为组织努力工作而得到内在的满足以及集体的认同。这种对成就的需要使得他们的行为还受到非金钱因素的激励。可以说，他们是兢兢业业、一心为主的国有资产“管家”，而非西方企业中所常见的较为纯粹的“代理人”（李绪红，2004）。

在中方人员接手农场前，农场曾几易其主，其中也不乏来自欧洲国家的有实力的大企业。在西方，作为所有者的公司股东主要通过一套规范化的激励机制（薪酬契约）和约束机制（董事会监管、严格的会计制度或其他信息系统）来诱使代理人为其利益最大化而行动。当时的农场经营者作为职业经理人，他们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利的（Eisenhardt, 1989）。相比之下，中方人员的行为不仅受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规范，更受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及国有企业政治文化的影响，因而更多地表现出“利他性”和“集体主义”的一面。这些年来，中方人员人均月收入约 800 美元，远远低于原欧洲驻农场人员的收入（1500-3000 美元）。在农场成立之初，由于剑麻前期投入大，农场遭遇资金困难，不惜停发中方人员的工资以保证生产运转以及当地员工工资的按时发放。

当然，国有企业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与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系，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决策与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近三十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政府选择保留控制的大型企业被改制为符合“现代公司”模式的企业，以国有资产的回报率作为首要关心的内容（维恩，2009）。中国逐步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将公有和私营经济角色和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并在世界市场的经济整合中实现了增长。但国有企业是中国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Jilberto and Hogenboom, 2007），是一种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为了保留指导国有企业按照政府的意志行动的能力，政府仍掌握着对国有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权，政府官员继续使用控股公司来追求比企业季度利益更广泛的国家目标。以投



资非洲农业为例，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竞争性的、大型农业企业投资非洲”也有其长远的利益考虑。首先，中国对海外土地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外开展农业生产，可以将国内的耕地置换出来；其次，中国对非洲能源和矿产项目的兴趣引发了一些负面回应，中国将用农业援助来进行平复(Brautigam,2009)。因而，投资非洲农业的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企业相比，更关注长远利益，而非短期利润的盈亏。

农场先后经历了两任中方总经理，每任总经理在任期结束后都得到了行政职务的升迁，而职务升迁的评价标准，不仅包括经济利润等商业指标，更包括在当地的影响力、社会好评，对上级指令的服从等非商业指标，而且非商业指标相对而言更为重要。

在中方人员的亲身示范和带动下，很多当地员工在工作中也更加勤勉。当地总会计师曾给笔者讲过一个与喝茶有关的故事。当地人很爱喝茶，受原英国殖民者生活习惯的影响，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固定的茶歇时间，农场设有专门的茶歇场所，一些工人完成工作后，聚在一起，品茶聊天，悠闲自得，茶中放糖，清甜可口。会计师发现中方人员也爱喝茶，但不是甜茶，而是较浓的苦茶，而且他们喝茶不是为了休闲和社交，而是边工作边喝，为了解渴和提神。会计师笑着对中方人员说，中国人爱吃苦。中方人员告诉他，中国有句俗语，叫先苦后甜，苦尽甘来。这种吃苦的精神也“传染”给了当地人，一位老工人不无感慨地说，在中国农场，我和我的同事都学会了更勤奋的工作。在中方人员与当地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农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剑麻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从2000年的92公顷，到2010年的1218公顷；其次，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在中方人员来之前，产量很难超过每月100吨，而经过改善生产设备和管理后，目前的产量为每月250吨；其次，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显著增加，之前不过150人，而现在达到了1000多人。工人们也确实尝到了“甜”，工资收入稳步提高，农场生活设施不断改善，一些工人还被农场派往中国参加技能培训；由于工人购买力的提高，当地的商品市场也较之以前更为繁荣。

四、讨论与思考

非洲国家与中国原属于两个不同的生活世界，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绝大多数中资企业在非洲是相对的新来者(Broadman, 2007)，企业派出的中方人员与当地普遍缺乏相互了解，与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因殖民主义历史而与非洲国家有着种种深厚的文化渊源相比，中国企业与当地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Lee, 2009)，中国海外企业的管理模式也正在形成过程中(Yeung,2000,2005;Ralston et al., 1999)，从上面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在寻求国际化的过程中，更多地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非遵从一条



清晰的路径”（Yeung, 2005），正如某位国有农业企业家所言，“在早年中非间的兄弟情谊逐渐让位于双方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模式时，中国的企业家们摸爬滚打，正在用自己的智慧慢慢摸索前进的道路和互动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保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商业惯例和组织模式，“这并非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合法性（legitimacy）”，因为现行的全球商业制度和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为主导；反过来，中国海外资本的扩张毫无疑问地将对现行的全球商业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带来启示和影响，众多的研究者已开始探究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Yeung, 2005; Lee, 2009）。

本文所呈现的这样一个中资农业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尽管仍然是粗糙和原始的，但却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视角。目前，国际上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诸如国际商业、组织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Yeung, 2000）、经济人类学或工商人类学（綦晓光, 2012）及发展研究等学科视角不断切入，构筑了探讨国际资本海外扩张的广泛平台。下面本文将主要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资本主义发展与海外扩张中的文化研究视角、全球资本主义海外扩张中的文化会通（cross-vergence），及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体系中的文化自觉等角度展开对此案例的讨论。

（一）资本主义发展与海外扩张中的文化研究视角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海外扩展中的文化研究视角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得以充分开发的领域，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东亚国家和地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所谓的“亚洲资本主义”（Asian Capitalism）或“中国资本主义”（Chinese Capitalism）（Crawford, 2000; Yeung, 1999, 2000, 2005）借助于东亚经济实力的崛起及新一轮自由主义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开始进入学界的关注视野，这些研究通常追溯至 20 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从中汲取营养——尽管后者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动力来源。该著作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即“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即从 16 和 17 世纪的清教教会和教派的“新教伦理”中成长起来的。“这些虔诚的信徒有力地把工作和物质成就放在他们生活的中心：对这些信徒而言，他们似乎并不看重其他事情，即使是像家庭、友谊、闲暇和消遣这样的事……任何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韦伯, 2010）。同时，韦伯也承认，这种关注点在当时似乎是“很不正统的”，因为“我们通常给予优先地位的是结构因素（诸如社会阶级和教育水平），经济和政治利益、心理和生理影响、权力和外部约束，以及不受任何限制的理性选择”，但是“社会科学家必须寻找脉络性地理解他人的活动，尤其当观察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之群体生活时学者们必须这样做”（韦伯, 2010）。



在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的《儒教与道教》中，韦伯继续将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和价值观视角伸至中国，并进而探究东亚资本主义之所以未发展起来的原因，即以儒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然而，韦伯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被一批国际商业和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所重新诠释和修改，这批学者主要针对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华商的企业运作模式，强调中国企业在管理和经营上独特的“关系”体系和“信用”体系，并以家庭经营为主要方式（Smart and Smart, 1991; Kao, 1993; Kiong and Kee, 1998; Mitchell, 1995; Van Den Bulcke and Zhang, 1995; Hsing, 1997; Yeung, 1997a, 1997b; Olds and Yeung, 1999; Yeung and Olds, 1999），同时，他们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应对机制来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Limlingan, 1986; Cushman and Wang, 1988; Yoshihara, 1988; Jesudason, 1989; McVey, 1992; Hicks, 1993; Brown, 1995; Suryadinata, 1995; Hsing, 1988），这些都与美国、欧洲等为主导国际商业体制产生差异，并被称之为“亚洲资本主义”（Asian Capitalism）或“中国资本主义”（Chinese Capitalism）（Crawford, 2000; Yeung, 1999, 2000, 2005）。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的来临，这些家庭式的企业在国际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职业化、去私人关系化等方面的趋势和压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关注国际资本海外扩张中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视角重新得以重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企业经营模式和价值理念开始对现行的跨国公司（TNCs）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形成冲击（Yeung, 2000），其关注的领域涵盖公司治理、企业管理战略和策略、国际兼并、人力资源管理、劳资冲突与管理，以及技术引进与升级等各个方面，除了如何进行有效商务管理、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价值关怀外，对于是否存在中国商业模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这种模式的优劣、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Yeung, 2000; Dirlik, 1997），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概念的开发和观点性的讨论，还缺乏基于具体企业的田野观察和实证分析。本文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一个尝试，并为此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份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与当地文化遭遇的案例，丰富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视野。

（二）超越“本土”与“西方”：全球资本主义海外扩张中的文化会通融合

在关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与地方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上，一些发展的人类学者受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强调处于“边缘”的社会被长期整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式，以及经济政治依附和或反抗的文化表达。这些研究通过系统的民族志将政治经济结构与人们所经历的实践联系起来，表现人们建构意义、应对压制及外力所采取的各种方式，强调行动者与他人合作、冲突并共同建构起社会生活，展



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与当地政治经济体系的碰撞过程（Ong, 1999）。这些研究秉承以本土文化为自己研究基点和研究主题，但其对本土的关注实际上仅仅是以“本土”和“西方”二者为主角建构和展现的，没有将二者之外存在的诸多权力运作、发展涉及的多方利益相关群体放入视野（杨小柳，2007）。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非暴力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迅猛趋势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不同文化的冲撞和互动达到了空前的广泛和深入（翁乃群，1999），地方文化处在不断混同与变化中，并对全球化产生了一整套新的多样化的回应模式（Long, 2001）；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些新兴国家不仅自身经济迅速增长，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也日渐显著，从而成为“本土”与“西方”之外的又一重要利益相关群体。在此背景下，以“西方”和“本土”的二元视角来理解发展实践已显得简单化，因为其忽视了发展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西方”与“本土”之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也在作用发展过程，如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文化遭遇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完全被动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运作过程，它不是单由外界强加的，不同的行动者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和不和，都在努力推进它们自身特定的利益和成果，尽可能地进行谈判并不断地达成妥协。意义、价值等由文化所构建，但它们随着行动者在实践中的行为可能性或变化了的环境得到多样运用和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意义和组织模式也产生出来。新的发展实践将会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构成挑战。

超越了“本土”和“西方”的二元视角，对来自新兴国家的行动者在其他“外围”国家（特别是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压力下，与当地不同行动者之间遭遇和互动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得以重视，然而这却是探索全球化与本土化过程复杂互动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互动模式的过程中，无论是走出去的新兴国家，还是东道主其他“外围”国家，他们的文化都是混合性的（creolisation）（Hannerz, 1992）。其混合性的文化特征都是目前的世界系统向非西方、非北方区域发展扩张而形成的。现代性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用一种颜色涂抹其影响过的地方，另一方面这种涂抹却与原来就有的不同底色创造出许多新的色彩来（蔡拓，2002）。在一个现代公司模式的组织框架内，两种混合文化相互碰撞并融合在一起，创建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异质的风格、结构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保留下来，并以新的多方面的意义来适应新环境（Spitzer, 2003）。这种适应与协同的特征更可能来自于各自原有的文化价值的力量，而非被西方文化所同质化。在文化互动中形成的特别的张力，推动着企业不断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企业内不同群体的共赢。

本文所呈现的非洲中资企业的中方经营者与当地员工的互动实际上是两种混合文化的遭遇与碰撞。在非的中方农业企业在组织管理模式及文化适应上中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个案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非洲中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



在组织文化上某些共性，如积极构建特殊关系以寻求安全的倾向性，对于和谐关系与一致性的文化需求，以及勤俭持久的长期取向等。这些身处海外的中国经营者在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他们不仅借鉴西方主流商业文化，更在本国文化中汲取力量，其中既包括传统儒家文化传统，也包括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以应对全球化压力，并寻求在东道国现有规则中获取长远益处。这种在文化适应中的韧性对于中国资本的海外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当然，不同的中国企业有着不同的利益、能力和限制，它们所面对的非洲“本土”也是多元的、不断变化的。这些因素构成了二者互动的条件，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方人员与当地员工在互动中，将一些“地道”的中国文化要素赋予了坦桑尼亚文化的意义，成为了具有坦桑尼亚特色的中国企业文化要素，这样一种互动模式超越了“本土”与“西方”的视野，实现了文化上的会通融合（crossvergence）（Ralston et al., 1993; Ralston 2008; Andrews et al., 2003），是一种双向塑造，而非单向的改造。

（三）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中的文化自觉

不管是上述的“中国资本主义”文献，还是超越“本土”与“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文化会通融合的探讨，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中的文化自觉，即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否能为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独特文化价值？如果有，那么又是什么？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发展历程中摸索出来的发展主义体系？亦或者是一种复合了上述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方的混杂文化？马丁·雅克（2010）在其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预言，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 19 世纪是海上霸主，美国在 20 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到 2050 年将成为文明的霸主，但这样的乐观在中国的思想界里却并未完全盛行。

诚然，中国是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但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历经各种革新，“富强”之梦压倒“文明之梦”，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一个尊崇儒家文明的“礼的世界”逐渐转型为一个狂热追求经济增长和科技增长的尊崇“力”的世界。自 20 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就开始变得暧昧不清了，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许纪霖，2010）。

事实上，文化自觉本身就是资本全球化的一部分，体现了现代性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现代性提倡创造精神和反抗精神，而且这种精神总是力图“与它寓居其中的、想象的世界断裂”；但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彻底的理性化又坚持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扼杀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个人主义和自治自立理想（王逢振等，2006）。在资本走出去的背景下，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文化传播、传播与反思的冲动。目前，随着中国 GDP 位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国内外



皆言中国“富强已达”，所需的是“文明崛起”，否则即便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其资本大规模走出去，但其对于世界的文明的支配权和影响力终究难以真正实现，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对于自身文化与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提炼，而“走出去”提供了回望自我的“距离”和参照。

参考文献：

1. 陈其南，邱淑如：企业组织的基本形态与传统家族制度——中国、日本和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2期。
2.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
3.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4. 李绪红：“代理人”还是“管家”——基于国别文化差异的中国国有企业竞争者的角色定位，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6期。
5. 綦晓光：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比较研究：以在中国的日本A企业和法国B企业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7年。
7. 索罗门，希金斯：从非洲到禅——不同样式的哲学，俞宣孟、马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38。
8. 罗尔·范德·维恩：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赵自勇、张庆梅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9.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0.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306-307。
11. 王逢振 谢少波：全球化文化与空间在中国的复制，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2. 翁乃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及其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3. 许纪霖：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爱思想网，2010年6月5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4493>
14. 许烺光：东西文化差异及其对今日世界的意义，清华中国研究学刊（新集），1960年第2期：216-237。
15.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16.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7. 杨美惠：“关系”的韧性及其新运作空间——对新近“关系”研究的批判，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8. 杨小柳: 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 社会学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19. 余晓敏: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 社会学研究, 2006 年第 3 期。
20. Andreas. J. (2008) . Changing Colors in China. *New Left Review* 54, November-December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756>
21. Andrews, Tim G., Chompusri, Nartnalin and Baldwin, Bryan J. (2003), *The Changing Face of Multinational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2.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Global Culture*, ed.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259 - 310.
23.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Broadman H.G. (2007).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5. Brown. R. (ed.) (1995),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6. Buckley, L. (2011) *Eating Bitter to Taste Sweet: An Ethnographic Sketch of A Chinese Agriculture Project in Senegal*. Apri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Land Grabbing Paper Submission
27. Crawford, D. (2000) Chinese Capitalism: cultures,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1, No 1, pp69-86.
28. Cushman, JW and Wang G. (eds.) (1988), *Cha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Tw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9. Dirlik A. (1997).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apitalism as paradigm, *Identities*. Vol. 3(3), pp303-30.
30. Eisenhardt M.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4, No.1, pp57-74.
31. Gupta V. and Wang J. (2003) Globalization And Convergence-Divergence Debate: Strategic Perspectives For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search*. Volume 1, Number 2.
32. Hannerz, Ulf(1993)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3. Hassard J, Morris J and Sheehan J. (eds) (2010)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conomic reform and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Vol. 23 No. 5, pp500-516.
34. Hicks, G. (ed.)(1993),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 Singapore: Select Books.
35. Hofstede, G., and Bond, M.H.. (1988) Th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6 (4), pp4-21.
36. Hsing, Y.T. (1997)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37. Hsing, 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 Jesudason JV (1989),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 The State, Chinese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 Jilberto, A. E. F. & Hogenboom, B. (2007) *Developing Regions, Africa and Indonesia Facing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 23 (3), pp305-306.
40. Kao, J. (1993) *The Worldwide web of Chinese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24-36.
41. Kiong TC and Kee YP. (1998). *Guangxi Bases, Xinyong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9, No.1, pp75-96.
42. Lee, CK. (2009) *Raw Encounters: Chinese Managers, African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Casualization in Africa's Chinese Enclav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 September, pp647-666
43. Li, T.M. (1999) *Compromising Power: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ule in Indones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4(3).
44. Limlingan VS (1986)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SEAN: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Manila: Vit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45. Long, N. (2001)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zation: Recontextualising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6. McVey R (ed.)(1992)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47. Mitchell, K. (1995) *Flexible Circulation in the Pacific Rim: Capitalism in cultural context*. *Economic Geography* 71,364-82.
48. Olds, K and Yeung KW (1999). *Reshaping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 globalizing er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7.
49. Ong, A. (1999)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Asian liberalism?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d Citizenship*. In Henrietta Moore (e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50. Ralston, D.A., Gustafson, D.J., Cheung, F. & Terpstra, R.H. 1993. *Differences in Managerial values: A study of U.S., Hong Kong and PRC manag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4, 249-275.
51. Ralston, D.A. (2008) *The Crossvergence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27-40.
52. Ralston D.A, Egri C.P., Stewart S, et al. (1999) *Doing Busi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anagers: A Study of Generational Shifts in Work Valu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0, No. 2, pp. 415-427.
53. Redding S.G. (1996) *The Distinct Nature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9(3), pp 426-440.
54. Richmond Y and Gestrin P. (1998) *Into Africa: intercultural insights*.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pp90



55. Smart, J. and A. Smart (1991) Personal relations and divergent economie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investment in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5.
56. Spitzer, N.R. (2003) Monde Créole: The Cultural World of French Louisiana Creoles and the Creolization of World Cultur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6 , 58-59
57. Sum N. and Ngai. (2005). Globalization and Paradoxes of Ethical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Code of Conduct in a Chinese Workplace. *Competition & Change*, Vol.9 June.
58. Suryadinata, L (ed.) (1995)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China: The Political-Economic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59. Van Den Bulcke, D. and HY Zhang (1995) Chinese family-owned multinational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process. In R.A. Bron (eds.),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Routledge, London.
60. Walder A.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1. Yeung KW(1997a) Business network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 study of Hong Kong firms in the ASEAN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73,1-25.
62. Yeung KW(1997b) Cooperative strategies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 study of Hong Ko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ASEAN region. In P.W. Beamish and J.P. Killing (eds.), *Cooperative strategies: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The New Lexington Press, San Francisco, CA.
63. Yeung, HW (1999)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Firms from Southeast Asia: Strategies, Process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Blackwell Publishers.
64. Yeung HW and K. Olds (eds.) (1999)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 Macmillan, London Press, Singapore.
65. Yeung. HW and Olds. K. (2000) Globalizing Chinese business firms: where are the coming from, where are they heading? in Heung HW. And Olds. K.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 London: Macmillan, pp1-28.
66. Yeung, HW (2005) *Globalizing Asian Business: Dynamics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Draft. For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Forces of Adjust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Edited by Dennis A. Rondinelli and John M. Heffron.
67. Yoshihara. K (1988)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国际发展研究机构介绍

A Brief Introduction for CGD

2001年11月设于美国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简称“CGD”）是一所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且独立运作的非营利性思想库，它主要运用囊括了政策分析以及创新性交流的具备顶尖水平的研究来将其思想付诸行动。该中心还旨在通过严谨的研究工作以及与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之间进行积极活跃的互动来减少全球贫困以及改善不平等现状，并最终致力于造就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繁荣、公正与安全的世界。CGD的主要创始人有三位，分别是 Edward W. Scott, Jr. C. Fred Bergsten 和 Nancy Birdsall（CGD 现任主席），他们在 CGD 创立之初的身份分别是技术型企业家、慈善家以及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此外，CGD 现共有约 100 名横跨各个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

CGD 围绕着“富裕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主题展开的研究涉猎广泛，主要遍布以下领域：援助的有效性、教育、全球化、健康、移民以及贸易，而对富裕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方面提出的具体的、实践性改善的建议及其相关研究的核心在于“主动性”或者是“首创精神”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中心于 2003 年同《外交政策》杂志共同发布的“发展职责指数”（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 CDI, 也叫致力发展指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就富裕国家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并用其来评估 21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繁荣发展、和谐政府与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CGD 希望通过这项评估活动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这里的援助并不仅是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还包括其他的 6 个方面，即贸易、投资、移民、环境、安全与技术。以这 7 个方面为评价指标，CGD 对 OECD 国家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鼓励受评估国家进行其政策的改变与调整，以推动富裕国家为改善全球贫困、不平等以及环境现状做出贡献。

CGD 的研究小组依照不同的研究主题进行划分，每年保持在 4-5 个，包括国际发展协会的未来工作小组、非洲发展银行工作小组、国际贸易的优先权改革工作小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与健康消费工作小组等等。与此同时，工作小组主持的项目成果包括：“聚焦于健康的优先设置：为更明智的公共消费建立制度（Priority-setting in Health: Building Institutions for Smarter Public Spending, 2012）”、“最贫困国家的自由市场（Open Markets for the Poorest Countries, 2010）”以及“世界银行在最贫困国家的工作进展：对新国际发展协会提出的 5 条建议（The World Bank’s Work in the Poorest Countries: Five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IDA）”等等。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网站：<http://www.cgdev.org/>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
(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农村发展与管理)资助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RCID)来源于1988年建立的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IAD),该中心属于联邦德国和中国的双边发展合作项目之一,其后又成为国际农村发展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大批中心的工作人员赴德国、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发展研究,陆续回国后,使得中心成为了我国第一所发展人才比较集中的、国际化的发展实践机构。期间,中心的研究人员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以及国际NGO组织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服务,使中心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国际发展咨询的研究机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心的业务开始由国际发展咨询逐步扩展为国际发展教育和发展研究,其发展教育的功能演化成为了我国第一所农村发展学院,而后成为了今天的人文与发展学院。其国际发展的研究工作延续成为今天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职能。基于长期从事发展实践和发展教育的经验,特别是对国际发展合作体系、运作模式、项目计划和监测评价等方面长期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国际发展研究更加成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凭借其特有的实力,致力于在中国对外发展合作的方式、政策,中国的非洲发展研究,以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国际发展研究等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王妍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民主楼

邮编:100083

电话:62737745

传真:62737725

E-mail: wangyanlei@cau.edu.cn

下载地址: <http://cohd.cau.edu.cn/main/>

内部资料,仅供参考,请勿引用